

于伶戏剧电影散论



于伶戏剧电影散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于伶是当代著名戏剧家、电影家，三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进步戏剧、电影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话剧史、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收辑的戏剧、电影论文，文笔精炼犀利，内容丰富多采，有自家的创作经验和对同时代战友艺术生涯的回忆，有对各个时期戏剧电影创作思潮的评论和对青年作者创作的热情指导。读者从这些文章中既可了解于伶充满传奇性的艺术道路，也可窥见到五十多年来中国话剧、电影事业发展历史足迹。

责任编辑 杨国还

于伶戏剧电影散论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永 乐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65,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2 1/2 插页3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 320 册

书号：8069·496 定价：3.05元

老骥不伏枥 余热可传人

(代序)

夏衍

知道《于伶戏剧电影散论》即将出版，并看了这本书的编目，使我既高兴又感慨。

使我高兴的是，这本早该出的书终于出版了，而这又是一本有益有用的书。我不属于“九斤老太”这一类人，我坚信未来属于青年，八十年代的青年一定会超过我们。——事实也正是如此，我说过：王安忆、陈祖芬、陈建功、凌力……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代的水平。但同时，我也不想讳言，由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和这之前的极左思潮的为害，在今天，不少青年人中还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最显眼的是，他们不了解百多年来，乃至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古国，同时，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的遭际又是一部血泪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中国戏剧运动也就是在和中外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批评某些人崇洋媚外，某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叛逃出国，这完全是必要的，但是追溯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都是这些青年受了“四人帮”极左思想——例如“读书无用论”、

“知识越多越反动”、“张思德、雷锋文化不高也很革命”之类的影响，把历史看作“四旧”，以大老粗为光荣的结果么？我讲这些，并不是无的放矢，我的确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青年，他们不仅不知道洪秀全、谭嗣同，有的人连孙中山就是孙文，也不知道了。对祖国的现代史尚如此，对祖国的现代戏剧史就更难说了。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有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革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很困难的。蒐集在于伶同志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写于四、五十年之前，因此，书中所叙所论，可能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很难于理解了。难懂，但它是真实的历史。中国话剧这棵嫩草，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艰苦环境中，由一批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的青年人闯出来的。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认为让“后来居上”的今天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从这本书中知道一点“前事”，对于党的十二大号召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肯定会有良好的作用的。

在这篇短文一开头我就说了“既高兴，又感慨”，那么，我的感慨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我和作者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之夜认识的，屈指一算，正好是半个世

纪。我们一起走过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做过一些工作，犯过不少错误，这是大家都一样的；不怨天，不尤人，跌倒了爬起来再干，也都是一样的，这是时代的局限，这是历史的悲剧，往者已矣，不必赘述。只是他折磨得比我久，精神负担也比我重。我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和“一小撮走资派”一起被“监护”的，而他则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受“潘汉年案”牵连就罢了官，“立案审查”。明知他问题不大，却不审不查，让他“暗中靠边站”着。拖了十一年，拖到“文革”开始时的八月二十六日，加上“四条汉子”同犯罪名再被“收监”，直到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批了“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之后，才获得“解放”出狱。最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长期认真的复查，终于给沉冤二十七年的潘汉年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于是，压在于伶同志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才得到了消解，这件事，想起来使人心酸，潘汉年是一个二十年代入党，出生入死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可是由于康生之流的诬陷，就在他以中共华东区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的时候，以“内奸”的罪名被捕了。危言耸听说是“挖出了埋藏最深的反革命集团”。这件事震惊了上海（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和第一副市长），当然也株连了不少人，于伶只是罢了官，没有被逮捕，“还算是轻的”。但是请想一想，一个有自尊心的共产党员头上，被戴上一顶“内奸”“同伙”的帽子，欲诉无门，呼天不应，究竟是什么滋味。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九六〇年春，为了要开第三次“文代大会”，我们几个负责做筹备工作的人到西华厅去向恩来同志汇报工作。谈完了之后，总理忽然问我：

“于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迟疑了一下：“听说还没有。”

“这次他能来参加？”

“他是文联的全国委员，按理是……”

“假如身体可以，要他一定参加。”

大会期间，总理单独约见了他。然后对周扬和我说：“于伶的问题要赶快解决，但要给他安排工作……”周扬同志通过中宣部把总理的话告诉了上海市委，结果呢，党中央副主席的指示，给上海的那位“好学生”卡住了！

再说一遍，往者已矣，不多说了，可悲的是平白地使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党员，闲白了少年头。但，可喜的是，我们的党毕竟是正确而伟大的，潘汉年死了，董慧死了，他们没有子女，可是，“四人帮”一倒台，就有不少过去和潘汉年同志共过事的同志给中央写了信，希望对这桩冤案重新予以审查。死者是不能讲话了，可是档案还在，来往的电文还在，和他一起工作过——特别是在最危难、最机密的情况下共过生死的人还没有死尽，于是，冤案终于平反了。

《于伶戏剧电影散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于伶是一个“老病号”，近年来还做过两次手术治疗，可是今年八月我和他一起去访问朝鲜，他还登上了金刚山。老骥不伏枥，余热可传人。

编者孔海珠同志要我写几句话，这就算代序。

1982年10月1日

目 录

DE61/119

老骥不伏枥 余热可传人 (代序)	夏衍 (1)
评《戏》月刊第一期.....	(1)
高尔基演中国故事戏.....	(8)
剧本月评.....	(11)
略论一九三四年所见于中国剧坛的新剧本 (一)	(15)
略论一九三四年所见于中国剧坛的新剧本 (二)	(21)
略论一九三四年所见于中国剧坛的新剧本 (三)	(25)
关于短片	(28)
国产影片的配音	(31)
看了美国之“桃李劫”后的对话	(33)
我忆聂耳	(36)
《复仇艳遇》	(40)
《汉奸的子孙》前言	(42)
《夜光杯》前言	(46)
中国戏剧运动之展望	(48)
《西班牙万岁》译叙	(51)

感谢以外的多余话	(55)
上海剧艺社与戏剧交谊社	(58)
拯救短小剧本的饥荒	(63)
上海剧运的三个时期	(67)
《女子公寓》改版题记	(70)
中法联谊会戏剧组与上海剧艺社	(75)
上海剧艺社的第一年	(77)
幕 前	(81)
《夜上海》小序	(82)
一年读剧记	(85)
爱好戏剧的开始	(93)
给 S Y	(97)
再给 S Y	(99)
我做了一个梦	(103)
由《女儿国》谈起	(105)
创作与批评之间	(119)
追思宋春舫先生	(123)
上海话演《上海屋檐下》	(126)
迎一九四一年	(128)
感谢郭沫若先生	(129)
感慨与期待	(131)
壮新中国剧社台湾之行	(135)
我们经受过更多的困难	(137)
无锡·丽人·英雄	(139)
我感动了两次	(141)

岁末杂感	(142)
《关不住的春光》	(144)
新中国电影运动的前途与方针	(147)
悼杨潮	(173)
期 望	(176)
我们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178)
祝衡山电影院成立	(180)
果戈理礼赞	(182)
总路线照耀下的电影艺术工作	(186)
为科学教育电影的献礼祝贺	(197)
珍贵我们今天已经获得的自由和幸福	(200)
正确地对待评奖工作	(206)
致热爱生活的人们	(212)
易卜生《娜拉》杂忆	(232)
悼念敬爱的洪老	(234)
《祝福》是一部好影片	(237)
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忆	(242)
杜甫仁科	(245)
《母亲》颂	(249)
《于伶剧作选》后记	(251)
谈宋之的	(253)
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	(264)
颂《在长征的道路上》	(266)
回忆中国剧作者协会和集体创作、联合公演	

《保卫卢沟桥》	(268)
党在解放前对中国电影的领导与斗争	(275)
谈谈写作《聂耳》的经过	(306)
从创作《聂耳》剧本得到的启发	(309)
欢呼《上海电影》	(316)
预祝本届“百花奖”取得更大胜利	(319)
《七月流火》初记	(323)
《七月流火》重新出版小记	(325)
默对遗篇悼阿英	(330)
一九八〇年随想	(343)
回忆“剧联”话影评	(346)
缅怀郑伯奇同志	(353)
纪念左翼文化运动五十周年	(362)
寄更大期望于《大众电影》	(366)
《戏剧春秋》新版后记	(368)
广播剧运动的前哨战	(373)
战斗的一生	(377)
编后记	编 者(386)

评《戏》月刊第一期

“在全国看不见一本纯戏剧的刊物”的年月，袁牧之先生本着“过去对于戏剧不曾苟且”的信心来“独干”一个“立场却是属于整个戏剧运动的”刊物——《戏》，“从有出这本刊物的动机直到付印不到二十天”，就能够在演出《怒吼吧中国》底剧场的紧张情绪中，给观众“带回去看”，这动机和努力，是够每一个戏剧的爱好者与戏剧运动的从事者虔诚地钦佩与拥护啊！

正因为这个“绝无仅有”的纯戏剧刊物，给与我们颇大的注意，也正因为我们对编者的动机与努力的钦佩与拥护，谨将读了《戏》的创刊号的感想，写在这儿。

首先从总的方面说：许是因为“创刊号”的关系吧，编者在篇首所揭示的“初步的计划”，似乎不曾实现好多（当然，我不是要求在一二期上就能实现了新计划的全部）。就“整理已有的剧本之是否适合于时代和舞台并鼓吹新的剧本多量地产生”这方面看，本期不曾整理或提供出一个旧或新的剧本是一大遗憾。倒是“木人戏的提倡”这一用心与努力，以及“研究院”之实际问题的科学地讨论与实验，是本期成功的地方。论著中几位“知名之士”的大作，恕我不客气地说，是不能使读者觉得够味儿与满意的。因为戏剧环境之恶与戏剧刊物之少，

读者是如何切望着读得如田汉、郑伯奇、公昌（朱端钧）、洪深诸先生的文章啊！但不幸于这次难得的机会中，前两位先生的话是这么简短（当然不是说简短就不好），后两先生则又简直是那么敷衍！倒是《与上海读者谈王无能》一文，给戏剧批评者们相當地配了副近视眼镜。不是吗？具有相当的技巧，拥有几十万观众的王无能，咱们为什么不以“希望于《母性之光》以后的金焰”那样的热忱，来希望“从舞台到银幕”的他呢？批评中的《评〈村长之家〉》当为戏剧批评者们认为“实获我心”与“正中下怀”的，以“仅仅是一个小小家庭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意识，没有纯熟的技巧，没有严密的结构”的一个失败的剧本，居然得“在《现代》上连续地占据了四期的篇幅，支配了编者和读者四个月以上的时间”。这不仅显着“中国剧作界的贫乏”，而在登载完后的四五个月中这尚是唯一的一篇批评这点上，更显得中国戏剧批评界是如何的懦弱啊！没有严格的正确的批评，也不会见完整的成功的创作，剧评者的懦弱与“剧作界的贫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儿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有“杂碎”中的一篇《关于演剧批评》，这虽是针对着汪漫铎君在《流露》上发表的《公演印象记》而说的，可是即在过去和目前的上海，我们就见过多少“连剧本都不曾看过一遍”，就作着“主观的一个全部的外行也可以胡谈的”所谓演剧批评，以致“误了观众，误了演出者，甚至于误了作者”啊！至于《怒吼吧中国》的公演特辑，是正与这剧的演出同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上演计划”与“布景”、“灯光”的图样诸实际材料的登载，也与“作者的话”同样是重要的演剧文献。记得有多少剧社的这类材料，因为没有登载和保管，就可

惜地随着公演之幕一闭而失去了。

其次，对于其中的某几篇文章，个人有点意见，要跟《戏》刊编者，《戏》文作者，以及爱好戏剧与从事戏剧运动的同志们作一商榷的：

第一是《戏剧运动的新途径》。固不必争问“戏剧运动”是否“已日渐消沉”？“旧的剧团散的散、停的停”与“最近有许多新牌子挂出来”是否是因“新货寥寥”，就“没给社会多少影响和效果”？以及“许多想有所作为的戏剧研究者，许多想努力干一下的剧团”是否在“徬徨犹豫，踌躇不进，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就不的话，顾仲彝先生这篇既“是推动戏剧运动的基本问题，是促进戏剧运动的当务之急”的“新途径的研究”，我们也应该热烈地来讨论的。看吧，顾先生是寻求与研究出了怎样的新途径？他说：“文艺界近来受当局的严厉的制裁干涉，和某派作家的排斥异己，不但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并且还妨碍到生活的自由。于是文艺家不能不以讽刺的文笔来讥骂当代的政客军阀；或以指桑骂槐的方法来寓现代的事实于历史”。“因此我想到两种最合适的剧本方式，我们如果在这两种方式上去寻求发表机会，当再不致有不敢动笔的苦痛了。其一是讽刺的喜剧，以讥笑的格调表现矛盾的可笑的事实于舞台上，例如莫利哀的《伪君子》。其二是寓意的历史剧……”。读完这一段大文章，才明了原来顾先生所谓新途径是这样畸形的变态的两条路！不是吗？目前出版界文艺界确是流行着“以讽刺的文笔来讥骂”的所谓“幽默”，“以指桑骂槐的方法”来作所谓“寓今于古”，可是这仅是一般身心不甚健全的病态文人，既不能满意现实，又不肯建设将来。既不愿甘心沉默而不

写作，又顾忌“妨碍到生活的自由”，于是只能幽默一下，“称快(?)”一时的，这是怎样“消极”的变态的举动啊！屈原的寓圣君美德于香草美人，泽畔行吟，结果葬身汨罗江心；淳于髡老先生的讥讽本事可大了，可是于战国时的军阀战争，民生疾苦，又有多少作用呢？也许我这样是太从消极方面来了解顾先生了，顾先生在前面曾说：“我们的剧本不但要给观众深的印象，并且激他们有所举动，还指示他们活动的方向，它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所以他想用这“两种最合适的剧本方式”，主张“作者所欲表达的愤慨、哀痛、暴露社会的罪恶，揭开狰狞的面目，暗示反抗的精神，指导活动的方式，都可尽情发挥，无所顾忌”的。这又是如何矛盾的话呀！不是因为“受当局的严厉的制裁干涉”，以致“不但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并且还妨碍到生活的自由”，于是方“不得已”地，畏退地来使用遮遮掩掩的法宝的么？怎么又会“都可尽情发挥，无所顾忌”呢？并且要真的来“尽情发挥，无所顾忌”的当儿，真的来“暴露社会的罪恶，揭开狰狞的面目，暗示反抗的精神，指导活动的方式”的当儿，那“东西”又来既不许你暴露与揭示，更不要你暗示与指导，于是用更“严厉的制裁干涉”，叫你“不但失去写作的自由，并且妨碍到生活的自由”的辰光，将怎么办？也许这是过虑，或者在没有到达这地步的辰光，我们不妨照顾先生所要求的新途径来做。那末，让我们进一层来研究：“讽刺的喜剧和寓意的历史剧”，是否是“最合适的剧本方式”？当然，中国古典戏曲中素有喜剧、趣剧与滑稽戏的光辉。莫利哀的许多喜剧名著，“以讽刺的格调表现矛盾的可笑的事实于舞台上”，是有它的“讽刺喜剧”的效果的，但这一

效果比之脱莱特郭夫的、《怒吼吧中國》的非“讥刺戏剧”来，是谁大？谁直接？并且不但如顾先生所说的：“中国近几年来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农村破产，工商衰微，苦痛与不安已普遍于全国民众，社会问题已急待有相当的解决”。而“九·一八”事变已高照起瓜分的明烛，太平洋沿岸的新战争已点燃了药线，在虫、旱、水灾中饥饿死亡之余的中国被压迫大众，已没有余闲来轻松地笑了，即使民族性是“爱看喜剧”与有“追怀古人古事的习性”，“爱古的遗风”！戏剧是宣传和教育大众的最好工具，她该走怎样的新途径？应视大众目前的遭遇与将来的前途而决定的！

第二是冷波先生的《民众戏剧》。观于这篇文章开始的口号与定义，好象所谓“民众戏剧”，就是年来剧坛上曾有过一番讨论的“大众化的戏剧”。我以为现在来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根据从这一问题的提出，讨论，与实行诸方面的事实来立言，不该还是如冷波先生这篇那样的空洞与混沌。因为稍为关心些演剧消息的人，都已经知道：从“戏剧大众化”的提出与讨论以后，已有熊佛西、陈治策等在河北定县乡村做的平民戏剧运动，青岛某剧团的到崂山乡村，借了农民的桌子搭台，以当地农民、东北难民、海军兵士作对象，演过两天戏，上海各工厂有过蓝衣剧团，泉州某剧团，在街头巷口、十字路、小菜场畔演过三天戏（见《泉州日报》某剧团的启事与通告），有些县份的民众教育馆也演过民众剧，大场有过上海土白的戏（见《民报》副刊“戏剧”周刊），山东各县也巡演过民众宣传剧。这些已是“民众戏剧”的事实，现在来抹杀这些事实，而以“最近……他们曾几度的跑到乡间去演剧，但是他们之所谓之

乡间，也不过就是苏杭无锡等等比上海稍僻静一点的地方罢了”（原文）。以及“有一次某剧社在一个工人的集社里演剧”。这前一次并非民众剧，后一次并不用肯定的事实来说话，又不在各地各次曾应用的方法、或好或坏的成绩、或大或小的效果上来批评与研究，而只是玩弄一下口号与定义，出下“戏剧怎样才可以到民间去呢？”和“怎样的戏剧才可以去到民间呢？”的问题，来空洞地混沌含糊地说一套，结果又没有得到自己所提出的问题的结论或答案。这样的方式，以之作文章未始不可，拿来讨论问题却有点“连自己也莫明其所说了”。不信的话，试问读者除了对他的一句一句尚读得懂外，对这全篇能得到个什么概念？所以恕我不客气地告诉编者，这篇实在浪费了“七八个定户的两面半篇幅！”

第三是袁牧之先生的《一九三三之上海剧坛》。说一九三三之上海剧坛，原可以不涉及过去，倘若为了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有叙述到一九三三年以前的话，那末似乎不应略去“南国”以外的艺术剧社与“九·一八”、“一·二八”之前后的大道剧社。因为艺术剧社的诞生与夭折，是有和中国整个的文艺运动之转变与遭受，同步调共命运的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至于一九三一年代的严重时期中，大道剧社是如何地尽了它的划时代的作用与任务啊！作者与编者的袁先生，“过去对于戏剧不曾苟且”过一点，今后将更努力地为剧运“推动”与“拓荒”，对这两个史实的略去，自然仅是非有意的疏忽，可是这一疏忽的影响是颇大的。

第四是《评〈虞姬〉》。登载在《文学》九月号中的《虞姬》，在剧本荒的目前，自然也不失为一可演的剧本。但个人以为决不象陈宪和先生所评的那么完整。其一，在结构上说，作者不